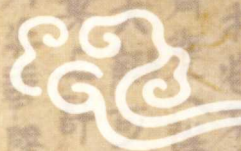


经学



两汉教育

米靖 著



经学



两汉教育

米靖

学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与两汉教育 / 米靖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8

ISBN 978 - 7 - 201 - 06215 - 0

I. 经… II. 米… III. 教育史—研究—中国—汉代
IV. G52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980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 - 2,800

定 价:28.00 元

序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过:中国“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①我在多年学习、从事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越来越强烈而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经学与教育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不了解经学的发展史,很难把握和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史;同样可以说,离开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也无法认清中国经学的实质和价值。

大约在 15 年前,当我们完成《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曾想着手开展“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的课题研究,并且邀集了几位年轻学者进行了多次商讨,还草拟了一份研究计划和大纲。后因忙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编写,更由于深感研究这个课题难度极大,信心不足,未敢贸然出手,只好暂且搁置了。然而研究的愿望和冲动却时时萦绕脑际,总想寻找机会尝试一下。

2000 年米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跟从我攻读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当他得知我有研究“经学与中国教育”课题的想法后,经过认真考量,决定围绕这个主题来作博士论文。当他向我认真谈起这个选择时,我欣喜之余,也为他捏一把汗。

米靖经过两年多顽强刻苦的钻研,按期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得到评审专家的肯定和好评,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现在贡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正是米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

这部著作从分析经与经学的本质关系入手,阐明汉代的经与经学开始具备了三种特性:即知识体系的总汇、意识形态的灵魂和价值判断的准绳,归纳

^① 《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第 265 页。

出汉代教育将经与经学的三种特性熔为一炉的基本途径和固定模式,而这种“以经为教”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部著作研究的重点是经学与两汉教育,实际涉及的范围则不止于汉代,而是回溯了夏、商、西周“六艺之教”,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学,这对于理解汉代尊孔读经之教的确立、维系和强化有重要的铺垫作用。事实上,“尊孔读经”已成为认识中国两千多年,乃至五千年中国文化教育特质的一个切入点,继而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为什么清末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在引进“西学”的努力中,仍顽强的坚守“中学为体”,把“尊孔读经”同“忠君”联系在一起而难舍难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第一件事是制定《普通学校暂行课程标准》,核心是废除“读经”,而袁世凯复辟帝制,首先是恢复“祭孔”和“读经”?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把“打到孔家店”作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中心口号?忠实地尊重历史,科学地阐述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给人一种智慧和启迪。

为一部著作写序很难,为自己学生的著作写序更难,然而又似乎是责无旁贷,只好勉为其难,草成数语,权充作序。

王炳照

2009年6月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

目 录

导 言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	(1)
第一节 “经”及中国传统教育的以“经”为教	(2)
第二节 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特质的定型	(12)
第一章 汉前以“经”为教的历史演变	(20)
第一节 从贵族教育到士人教育:以“经”为教 格局的形成	(20)
第二节 秦朝“吏师法教”的贵族教育遗风和以 “经”为教的潜伏	(38)
第二章 经学与两汉经学教育社会适应性的诠释与认可	(45)
第一节 “汉道”与经学教育合法性的确立	(47)
第二节 阴阳五行人性理论:经学教育的人学 基础诠释	(73)
第三章 “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性与经学教育的 “王官学”性质	(94)
第一节 “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性	(94)
第二节 汉代经学教育的“王官学”性质	(101)
第四章 经学与两汉教育培养目标与内容的变迁	(127)
第一节 通经选士与文吏和儒生培养目标的 融合	(128)

第二节 经学之争与“通儒”的培养目标及教育内容的确立	(151)
第五章 经学思想下的教育价值体系及其落实	(173)
第一节 汉代的“礼”教	(174)
第二节 汉代的“孝”教	(189)
结 语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15)

导 言 经、经学与中国 传统教育

《诗经》、《尚书》、《礼》、《周易》、《春秋》等五经是上古三代文化的凝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从汉武帝开始奉行“独尊儒术”的政教宗旨之后，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五经渐次扩充，发展成为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在内的十三部典籍，统称为“十三经”。它们被封建统治阶级定为千古不易的“经典”，既是天道人事至高规律的完美表述，也是统治者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思想根源。而在儒家“述而不作”思想的指导下，对儒经的阐释即经学则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学者必须离经辨志、依经立论，代圣人而立言。任何违背经文微言大义的言行，都被视为离经叛道，罪莫大焉！因此，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学即为国学，所谓“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②。因此，经学统摄着中国传统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教育等等一切学术文化。在这二千多年的经学发展史中，累积而遗留下来浩如烟海的经学著作，仅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录，就有 1773 部、20427 卷。而事实上，由于社会动荡或其他历史原因又使不少的经学著作湮灭不存！

①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5 页。

② 马一浮：《楷定国学名义》，见马镜泉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 页。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经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即与教育密切相关。一方面,“经”的结集成典,主要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对贵族的教育,以进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因此,无论将经的性质定为“六经载道”还是“六经皆史”,而从其起源来看,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经与经学,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内涵、价值体系、礼仪习俗、语言文字等等内容,而且还包含着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通过历代学者的诠释,经学不仅始终是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而且也成为教育与选举考试最主要的内容。因此,诵读与研习经书始终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与内容,而且通过深入地、广泛地教育,经学内容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得以世代相传。

第一节 “经”及中国传统教育的以“经”为教

一、“经”名含义的发展与变化

“经”名的起源与演变,是历来研究经学者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但却从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主要以所谓的“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四种说法为代表。周予同先生言之甚详。^①而事实上,在作者看来,由于“经学”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之术是经过统治者扶持与经学家诠释来完成的,二者在互动与利用中加诸古代儒家典籍以“法定”的光环。因此,“经”名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由“泛称”向“专称”转化的过程,其所指和内涵则不断地缩小与精确,其地位则不断地加强与巩固。因此,“经”名的形成与发展,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从历史的“长时段”着眼,来看待其所反映出的历史真实。

如果从造字法来说,“经”最基本的含义应当是织布的纵线,《说文解字》云:“经,织也。”《玉篇》云:“经纬以成缁布也。”因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为:“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世谓之天地

^① 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1~844页。

之常经。”后来，又因治丝之义而引申为经纶天下国家，如《易·屯卦·象》云：“雷震屯，君子以经纶。”郭沫若先生也说：“经是后起字，指经营、计划的意思。”^①由此可见，经之初义实与典籍毫无关联，从中国古代典籍的历史沿革来看，也确是如此。在孔子以前，从未有以经名书者，孔安国在《尚书传·序》中指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邱》。”显然，上古之书，不以经为名。《礼记·王制》中也曾记载周朝的国子之教，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由此又可知，周代也还未以“经”称此四部书籍。

出现以经称书的现象是在孔子时代，而且不止一家以经称书，这是一个经名泛化的时期，许多书籍皆可称经，当然对于其“泛”的程度学者有不同的认识。章太炎认为凡是线装书都称经，他说：“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②而刘师培则认为由上古官方所用的典雅“古文”撰写的书册才是经，他说：“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文之多文言也，于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用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与鄙词示异。”^③即官方典藏之书才可被称为经，以显示其在政治与文化地位上的重要性。又因其尊贵，所以在材料与形式上也与其他书籍有显著差别。如范文澜先生就指出“经”之成为典籍名称源于“金版”之书，由于“大典常刑，古皆铸金”，后“金”名废而代之以“经”名，“经”为“金”之假借。^④这种对“经”名来源的解释指出上古时期把重要典籍铸金以为政治行事之秉守的历史状况，表现出早期官守之书的显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书之于简策的而称“经”之官书，其尺寸也有非常具体而明确的规定，郑玄《论语序》说：“《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章太炎先生也指出：“周代《诗》、《书》、《礼》、《乐》皆官

①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金文丛考·金文释辞·释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③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1册第2课，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④ 范文澜：《群经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页。

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①可见藏于官府经典之书形式上的尊贵。如果这些史实确为真,这大约反映了学术官守时期官府所藏典籍的情况,也是后世称“经”之书的来源。

西周时,学在官府,典籍掌于职官之手,到了春秋战国,周天子权力削弱,学术下移,史官所执掌的官书则成为诸子学知识与思想的共同来源,虽非儒家所独有,却为儒家所擅长,所以《庄子·天下》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而且,孔子还整理六经,使散乱的典籍得以统一和流传,《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云:“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修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明确指出“六经”之书称为经的说法,也与孔子有密切关系,《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道》也说:“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关于“十二经”,有三种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指出:“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无论何者,都没有超出六经的范围。

这里,需要讨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六经”的体系何时确立,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是根据如上《庄子》中的《天运》、《天下》两篇记载,认为“六经”系统在先秦已经形成;其二是根据《荀子》一书中屡以《诗》、《书》、《礼》、《乐》并称,而未将《易》列入^②,则认为“六经”系统成立于

①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② 《荀子·劝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礼》之敬文,《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另有多次提到此五经,但并未论及《易》。

秦汉时。这个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近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发现,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史料,《郭店楚简·六德》中载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①的语句。意为从《诗》、《书》、《礼》、《乐》、《易》、《春秋》中观夫妇、父子、君臣之道。此处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提,尽管并未提到“六经”一词,但与《庄子·天运》次序相同。当前,学界普遍认为郭店楚简中的儒家部分应为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孔门“后学八派”的著作,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孔子的七十子后学已经研习六经。不仅证明六经系统在先秦已经得以确立,而且《乐经》也应当确有其文,不应只是乐谱。否则似乎从乐谱里不太可能观夫妇、父子、君臣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打破了学术官守的局面,因此,称“经”之书不再仅是官府所藏之典,逐渐地先秦诸子学的某种纲领性的学说与文献也开始被称为“经”,六经具有这种性质,而其他诸子学的典籍也如此,“如《国语·吴语》‘挟经秉抱’,则兵书可以称经;王充《论衡·谢短书》‘至礼与律独经也’,则法律可以称经;《管子》有《经言》、《枢言》,则教令可以称经;《汉书·律历志》援引《世经》,则历史可以称经;《隋书·经籍志》著录《畿服经》,则地志可以称经;《墨子》有《经上》、《经下》篇,《韩非子·内外储说篇》另立纲要为经,《老子》到汉代邻氏次为经传,贾谊书有《容经》,则诸子也可以称经”^②。此外,还有道家的《黄帝四经》、法家李悝的《法经》、天文家的《星经》、医家的《医经》等等。因此,此时,经不是儒家“六经”的专名,而是对学术经典的尊称。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经本是先秦子书的一种著述体例”,“但儒家所谓经同诸子所谓经,是有所不同的。即诸子所谓经,多出于自家所作,其目的是把它置于立论的主体地位而与传、说等相对。儒家所谓经则不然,并非出于自家所作,最初只是用于称由前代传下并经孔子删订的几部典籍,即所谓六经,其他是不能称经的”^③。所以,在儒家那里“经”逐渐会有“道”或“法则”的意思,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孟子·尽

①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② 朱维铮编:《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③ 葛志毅:《经与经书意义之再阐释》,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5期。

心下》云：“君子反经而已矣。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此处的“经”已开始具有了“常”的含义。

给儒家六经赋予天道政治的意义，将其推上至高无上的思想学说位置则是汉人的业绩。首先，汉儒认为“经”为圣人制作。《北堂书钞》卷九五《经典》曰：“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王充《论衡·对作》云：“圣人作经。”魏晋之际张华所著《博物志·文籍考》中也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郑玄注《毛诗》曰笺。”

其次，汉儒将“经”刻意地训为“常”。《周礼·天官太宰》云：“以经邦国。”郑玄则注为：“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乘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以守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又有由“经”之“径”意，而引为“常道”，有东汉训诂书《释名》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因此，经中常含天、地、人不易之“道”，如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天地为万物之郭，五经为众说之郭。”《抱朴子·尚博》也说：“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汉代名儒匡衡的思想颇能反映这种认识，他认为六经乃“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①。六经所蕴涵的旨意确为天地之不易常道，是指导人世社会的纲常。

第三，汉儒将经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指出“经”蕴涵着“五常之道”。班固《白虎通义·论五经象五常说》最为直白：“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五伦观念在汉之前只是一套注重人生和等差之爱的伦理学说，并无正统礼教的权威性与束缚性，而将五伦观念上升为“五常之德”，则使其成为“维持理想上的常久关系的规范”^②，成为一种绝对的要求。汉儒笃信五行阴阳之说，将其融入儒学，又以学术附于政治，相信五经之学可以治世，因此其学术信念在于释经必益于实践，通经则旨在致用。最终，汉儒将五经认作万世不变的天道的化身，成为统治阶

^① 《汉书·匡衡传》。

^②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见王元化主编：《释中国（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4页。

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和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皮锡瑞将这种信念表达的淋漓尽致,他说: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①

因此,汉儒极力强调六经所含之道的恒常与不变。唯其如此,方能确立其学术的权威性。才能真正成为国家政教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从汉武帝执政初期始,经学开始成为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逐渐成为了中国中世纪诸王朝理论基础与行为准则的学说体系。

二、对经的性质的探讨

在历史上,经的性质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形成了“六经载道”与“六经皆史”两种水火不容的观点。笔者认为六经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则多为“史”;就其在中国中世纪的社会地位而言,是“载道之经”,并且成为统治思想与理论;而就其具体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言,则是“教科书”,成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如上文对经名的阐释,“六经载道”的观念始于汉代,汉儒认为孔子为汉定制,治国修身的大义均在六经之中。这种思想真正完成于宋明理学;程朱之学更倡此说,《程氏遗书》卷二上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云:“或问《左传》疑义。曰:公不求之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于《左传》;《左传》纵有道理,能几何。吕伯恭爱与学者说《左传》,尝戒之曰:《语》《孟》六经多少道理不说,恰限说这个;从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可见,宋明理学对六经载道的信仰之深。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持“六经皆史”观点最著名者莫过于清代的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许多篇章中又一再出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论点。而实际上经书为史的命题在唐代已有出现,如王通《中说·王道》篇云:“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由此可知,以经为史的观念在唐代已经有所表现。至于明确地提出“六经皆史”,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王阳明《传习录》中记载与其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阳明全书》卷一)王世贞在《四部稿》卷一四四亦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王之世,若泯若灭,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到了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在其《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说得就更加明确了,他说:“《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交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商颂鲁颂》中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尽管“六经皆史”的观念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最为系统,最为著名。因为其思想的主旨在于反对程朱理学,意在将“六经”拉下神圣的思想统治位置,将其复原为史书的位置,从而解放经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今天看来,六经载道自有其历史的限度,应当将其从意识形态的神圣位置拉回到其应有地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或忽视经学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从六经的历史作用来看,将经与史的概念等同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笔者则尝试从知识演化的角度将五经看作是教育知识。首先,五经的结集成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知识的发展变化相一致。西周时期,中国是贵族政治,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表现出“学术官守”和“学在官府”的特点。职官系统因职能的分化而掌握着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知识。因此,学术知识出现分化,并且表现出浓厚的职业化特点,成为后来诸子学重要的“背景知识系统”。这也就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认为“诸子出于王官”的原因。李零在其《中国

方术考》一书中,对于古代官学的知识分化进行了描述,共分为典册、六艺、养生知识和烹调技术、法律、簿籍和图册、家艺知识、工艺知识七大类,分别由祝宗卜史系统的文职官员、史官系统和师氏系统、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司土司寇和史官、司徒系统的官员、司徒系统的农官、司空系统的工官执掌。从总体上看,分为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现在所说的科学技术和宗教迷信有关;另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宗教和军事知识。周公之道,则主要体现在由史官世代编辑、保存的上述典籍的一类二类中。它们是后世儒家六经的最初萌芽。至春秋战国时代,学术官守的局面被打破之后,官学知识成为各种私学的背景,“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易》)、典谟训诰(《书》)、诗歌(《诗》)、礼仪(《礼》)、编年史(《春秋》),大抵出于上述七类官学的第一、第二两大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七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是出自第一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则与第三类有关。另外,法家和名家也与刑名法术之学和纵横驰说之术这些新出现的知识系统有关”^①。儒、墨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阴阳、道两家及由道派生的法、名两家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

其次,五经是具有浓烈伦理价值性的知识。《尚书》中保留了不到二十篇商、周时代的政治文件。其中不仅述说着历史的史实,也表现出了当时统治者的宗教观念、政治观念及为政的态度与心情,钱穆先生指出:“大体上他们常抱着一种敬畏与严肃的心情。他们敬畏上帝、敬畏祖先、敬畏民众的公共意志。”^②这种深藏着的政治伦理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根基,因此,《尚书》之成为教材并不只是历史典籍,其中含有教导后世的精神与灵魂。《诗经》较《尚书》晚出,其中有宗庙祭祀的歌曲,也有历史事件的描述,还有男女两性婚恋的内容,也不乏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与号呼,包括了上层与下层政治、生活的诸方面。在古人看来,《诗经》蕴涵着人生的伦理观念,其教化的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学的价值,而汉代的《诗经》诠释学正表明这种倾向,明代张燧说:“汉人立学官讲《诗》,专以义理相传,是故卫宏序《诗》,以乐为乐得淑女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6页。

之乐,淫为不淫其色之深,哀为哀窈窕之哀,伤为无伤善之伤。如此说《关雎》,则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①罗根泽先生也指出:“两汉是封建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绩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地享受那时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于儒家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它的护身符。”^②这种功用就是将《诗经》所蕴涵着的“教化”含意加以诠释与阐发。^③《周易》上下篇的本文,本是占卜之书,旨在教人避凶趋吉,但其主旨却具有人文性,希图在人生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找到一种潜在的规律,因此,“最先此种占卜应该是宗教性的,而终于把它全部伦理化了。而且此种的伦理性的指点与教训,不仅止于私人生活方面,还包括种种政治、社会、人类大群的重大事件,全用一种伦理性的教训来指导,这又是中国文化之一个主要特征”^④。《礼》书也是重要的典籍,最先,礼的起源是为了祭祀,其内容则是种种仪式,这种宗教上的仪式,被政治化后,则成为政治上的礼,政治上的礼被伦理化后,则成为生活的要求与规范。成为贵族生活的方式与习惯。经过孔子的传播与诠释,贵族礼平民化,使礼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规范。可以说,礼包含了古代社会中宗教信仰、政治原则、人生规范等等内容。产生于孔子之后的《仪礼》、《周礼》则是对于上古礼的内容的记载,而《礼记》则着重于阐发礼意。《春秋》乃为史书,其传统渊源于西周中叶出现的各国史书,孔子著《春秋》打破了国别为史的旧习惯以及官守其史的旧传统。《春秋》记录了将近三百年内几个大国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与事件,是我们了解当时历史的重要典籍,但更重要的是《春秋》中包含着深刻的褒贬的“笔法”,有着惩恶扬善、令乱臣贼子惧的重要伦理价值。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五经的确是上古知识的总汇,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文学、历史、社会种种规范与要求,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古人一套价值体系的载体。正是这套价值体系,适应了封建社会的需要,使其具有了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此处所强调的经学的知识性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相混淆。也正

① (明)张燧:《千百年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③ 张海晏:《〈诗经〉在汉代的教化功能——齐鲁韩毛四家〈诗〉学合论》,见《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经学今论初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